

孙逸仙夫人忠于信仰

[美]兰德尔·古尔德著

王丽娜译

这篇译文的原文是今年5月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的同志在收集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用英文撰写的论著及国外人士撰写有关宋主席的文字时查到的，原载纽约1930年1月22日出版的《Nation》杂志130卷。我们发现篇中引用了宋主席的几节重要文字。其中一部分是《宋庆龄选集》中发表过的，即《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一文的摘录。其它两部分至今未见发表过。今年五月参考消息刊登的《海伦·斯诺谈宋庆龄》一文中仅提到1929年5月6日宋庆龄在离开柏林回国时所发表声明中的这样一句话：“我再次强调我在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所作的声明，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我不再参与国民党工作。”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古尔德的这篇文章翻译出来，供广大读者了解宋庆龄主席在艰难时刻忠于孙中山先生信仰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有关文献内容。由于译者外文水平有限，译文曾请徐士瑚教授校正，特致谢意。

译者识

一个隶属于现在国民党政府的中国人曾经到孙逸仙夫人的那所座落在法租界的绿色百叶窗的房子里拜访了她，并且居然说道：“如果你不是孙夫人的话，我们就会砍掉她的头。”然而，孙夫人爽快地笑着对她的愠怒的来访者回答道：“如果你是假装的革命者的话，那你无论如何也要砍掉它！”

短促的四年过去了，孙逸仙博士早被提高到中国圣人的地位上，他的学说，正如基督的学说一样，用作墙上的座右铭倒很漂亮，但是用作现实世界中的严肃的指导，却已是“太行不通了”。孙夫人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就在于她拒绝相信孙博士的思想行不通。这种惹人不开的态度是由于这一事实：她不仅仅是一位悲痛孤孀，而且是一位有权使孙博士的言论保持活力的坚定的人。

要理解为什么孙夫人作为一个左翼领袖对现在的右翼国民政府是一种特殊的烦恼，我们必须记住她是如何紧密地与现政府有着血缘的关系。首先，她是行政院长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她也是与蒋介石本人有重要关系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姐姐，她还是孔祥熙夫人的妹妹，而孔是工商劳工部长并且是孔夫子的直系后裔。另外，孙博士的独子、现任铁道部部长孙科，是她的继子。面对着这种种情况，孙夫人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下述声明中表明了自己的坚定态度，从那时以来，她从未离开她的立场。声明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已经到达这样一个时刻，必须给孙中山博士的原则与政策下个定义，有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这些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这一声明指出，孙博士的第三个极其重要的主义，即“民生”，在当前危机下正处在存亡攸关的时刻，声明强调孙博士认为这民生主义是革命的基础。孙夫人在声明中说：

“从民生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

声明还谈到有关孙博士的经历：

“孙博士很穷，他到十五岁时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但是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孙夫人发表声明的时候，她是做着一种艰苦与危险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意味着生命的危险（这对于一个具有这样才能的妇女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意味着与家庭关系的破裂和一代人的巨大敌意。发表汉口声明之后，孙夫人过了几乎两年的自愿的流亡生活。1929年5月6日，她在柏林宣告：

“我正首途返回中国，目的是为了参加将孙逸仙博士的遗体迁到紫金山，他生前希望埋葬在那里的。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必须说明，我强调坚持1927年7月14日我在汉口发表的声明，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及其活动，我在该声明中宣布退出国民党的工作。为此，我要充分地表明，我出席葬礼决不意味着并且也不能被解释为暗示一种缓和以致改变我的决定。……

“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只要国民党的领导人反对孙逸仙博士的基本政策，我参加孙博士的葬礼就不意味着我修改或撤销我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的决定，也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孙博士的基本政策就是：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与苏

联密切合作的政策，联合工农的政策。当这三项政策是革命的原动力的时候，我们就在实现国民党的原则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现在这三项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已再次成为军阀与反革命的工具。……”

尽管孙夫人去年春季不在国内，她还是在当时国民党推选中央执行委员的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她到达北平开始参加孙博士的长途迁葬行程——从北平西山到南京城外的新陵墓——的时候，孙夫人非常明白地表示，毫无把她的名字和声誉借予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意思。她甚至于也没有和她家的成员呆在一起。她经历了漫长而难处的葬仪，看到棺材平安地放置在耗资百万元的长眠之所之后，便回到了她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的房子。她保持沉默，有一段时间。1929年8月1日，孙夫人射出了一发子弹，如果不是国民党压制的话，这发子弹一定会在全国引起反响的。这发子弹采取的形式是在国际反战日发往柏林反帝大同盟的一封电报。鉴于中俄关系的紧张，这个电报至少说也是及时的。“不合时宜”这个词是形形色色的狂暴的来访者所喜欢用的词，这些人立即来到她家，要求她否认或收回这个电报，或者至少答应以后规规矩矩。这个电报的内容是：

“今天各被压迫民族已经组成一个巩固的反帝反军国主义的阵线，而反动的南京政府却与帝国主义分子联成一气，残酷地镇压中国的广大民众。反革命国民党头目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清楚地暴露给世界。他们在背叛了民族革命之后，势必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且企图挑起中俄战争。

“但是，中国民众不怕压制，不受说慌宣传的迷惑，他们将会只是站在革命一边战斗。恐怖主义只是有助于把更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并加强他们的决心去战胜当前的嗜血成性的反动派。……”

这封电报最初在上海地方被人忽视了。上海各家英语报纸觉得它们和国民政府斗争已经够多了，一家重要的英人所有的日报不准通过中国邮局发行，这些报纸认为没有理由再去和政府争

吵。这封电报的歪曲的译文最后刊登在一家英国人的报纸上，这个译文是由日文转译的，文中把孙夫人描写为鼓吹恐怖主义政策的人。那家英文报纸没有理睬电报的真正译文，这份译文送到该报是想纠正那个歪曲的译文的。中国报纸没有机会得到任何译文，但政府官员和党的领导很快获悉了孙夫人这个最近声明。他们的情绪，如果传闻是真实的话，是远远不一致的。有的人明明白白是同情的，而这种同情他们却不敢当众表示出来，另一些人是非常恼火的。当有人作出努力，用中文小册子的形式将该电报分发出去的时候，分发者被逮捕了。有一些人在南京路新新大百货公司楼顶上散发传单，当警察看到传单中包括有用中文写的触怒当局的声明的内容时，他们发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散发传单的人的身分。孙夫人自己说：“自从我发出这份电报后，我内心感到安慰（她说时手捂着胸膛），我必须表达我自己的意思，对我个人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是不关紧要的。”

虽然她的房子被人监视，虽然来访者被人跟踪，虽然在夜晚她的打字机嘀哒的声音被误以为是“通向莫斯科的一个秘密无线电”，孙夫人还是镇静的，既没有辛酸，也没有沮丧。她今天的感情仍如两年前一样，当时她写道：“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过去领导革命的人现在已经走上了歧途。”

1981年8月译

